

# 一九八〇年的危機與中共

詹 鵠

(Chalmers Johnson 柏克萊加州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本文為其向第九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所提論文—編者註。)

本文的用意是在透視我和許多人所見的國際關係的主要轉捩點。這個轉捩點即是個分水嶺，劃分出兩個時代。前一個時代是第一次冷戰及日後演變成「和解」(détente)的時代；後一個時代是第二次冷戰及其未定的演變。後者即是一九八〇年的危機。我所謂的一九八〇年的危機，不單指伊朗革命、美國人質被扣於德黑蘭，也不單指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入侵阿富汗。蘇聯侵阿之舉，至少部份意圖是在鞏固一九七八年四月阿富汗的親蘇政變。以上這些事件的重要性是，它們揭露了一九七三年左右即已形成的潛在局面。當然，伊朗和阿富汗事件本身即具有重要性，但是沒有下面我將敘述的背景，它們却不能構成我所指的那種程度的危機，喬治·肯楠(George Kenan)最近宣稱，蘇聯入侵阿富汗是「防衛性的而非攻擊性的」。他並且提到「有沒有蘇聯的軍事威脅是一種猶待證明的事實。」假如把阿富汗完全置於其歷史背景之外，我可能同意他。但是在目前國際事件的背景下，我相信他的觀點是非常短視的。然則，一九八〇年的危機更大的背景是什麼呢？

這個危機就是，世界的權力平衡、以至太平洋地區(日本、蘇聯、中共 and 美國)四個強權的權力平衡，轉趨有利於蘇聯的事實。我只須舉出一些事件說明這種演變。在蘇聯方面，成功之處有：蘇聯與古巴干預安哥拉、衣索匹亞、南葉門和別處；蘇聯和越南結盟並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蘇聯入侵阿富汗；蘇聯部署一些新式全球戰略的(SS-18)和歐洲戰略的(SS-20)武器，並且加強太平洋艦隊和部署二十架以上的「逆火式」(Backfire)轟炸機於西伯利亞的空军基地。蘇聯的軍事支出並無減少的跡象，蘇聯不顧現實的經濟壓力，而投下國民生產總額的百分之十一至十四於國防(一九七八年美國花費國民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五於國防)。

相形之下，在一九七〇年代末的同一時期，美國單方面決定自韓國撤出地面部隊(這項決定現在已被修正)；決定取消部署B-1轟炸機、長程巡弋飛彈和強力輻射彈頭；中止和臺灣的防禦條約；忽視、容忍或者只是口頭上抱怨蘇聯軍隊部署於古巴和千島羣島南部；儘管蘇聯於卡特執政初期不考慮削減戰略武器，美國仍擬簽定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

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美國發現它無法面對伊朗革命，並且無真正能力應付阿富汗事件。卡特總統曾經說，阿富汗的干預「徹底地改變了」他對俄國人的看法、甚至他對「和解」的承諾。很可能，阿富汗的被侵對美國的影響會跟一九五〇年韓戰一樣，後者曾扭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裁軍趨勢。一九八〇年的危機將如何改變國際局勢仍不明朗，但一九八〇年的危機是一種真正的

機，却很清楚。

究竟什麼因素導致這種危機呢？三組複雜的事件均甚重要。以下，我不按重要順序，逐一列舉這三組事件。第一是，中共毛思想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失敗，導使中共「向西方大躍進」（亦即，中共不再在共產陣營內部和蘇聯競爭，而「叛離」投向西方）；第二是，蘇聯繼續擴張軍備，奠立基礎，以便一有機會便能在第三世界實行其新帝國主義，並能對美國和日本在外交上運用「中共牌」的威脅，作出尖銳的反應。第三是，越戰結束後，美國產生我所提過的「沒有麥高文的麥高文主義」。這是美國傳統的道德觀念、新孤立主義以及美國厭倦於在日益競爭且行爲難測的盟邦中間維持結盟等三種因素的混合<sup>①</sup>。我們現在就簡單地探討上述三組事件，尤其是第一個。

中共的叛離共產集團意味著，假如第二次冷戰得以發展，則它將和第一次冷戰大異其趣；在將來的冷戰中，中共將是盟邦協約的一員。中共已從一九六〇年代的強烈反美和反日立場轉變爲一九八〇年公然反蘇的立場。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共第十一屆第五次中央全會決議恢復劉少奇的名譽，表示中共即使尚未推翻毛澤東的名字，至少已推翻了他的思想，並且表示鄧小平嘗試和西方、日本合作的政策已居上風。

然而，直到不久以前，民主陣營的盟邦和蘇聯對中共這些演變的評估曾有很大的差異。美國和日本對於中共的改變所作的反應是雙重性的：它們一方面擴大經濟、商務和文化的接觸，但另一方面對於政治和軍事合作公開地表現得很小心。一些美國領導人和國防方面的有識之士（例如，布里辛斯基、斯勒辛格、賈克遜）公開揣測，在傳統武器和核子武器方面的軍事合作具有可能性。去年這種揣測太過明顯，以致國務卿范錫不得不於去（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發表聲明：「我們沒有任何想改變政策的意圖；我們不會出售武器給中共。」（當然，這是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前的事。）然而，中共方面大半會把非官方的評論看得比官方的聲明更嚴重，並且相信他們和美國已有某種政治和軍事關係正在進行中，尤其是一九七九年二月和三月間，中共入侵越南時，美國對中共的公開批評並未影響雙方關係的發展。

同時，蘇聯對於中共、日本和美國的合作表現得十分誇大狂妄。早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布里茲涅夫在明斯克（Minsk）演講時就說過：美國不應當對着蘇聯「玩『中共牌』，這是既短視且危險的政策。提議玩『中共牌』的人必將深深後悔。」（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在蘇聯的旅途中，好多次聽到蘇聯政治學界的專家提到明斯克的演講，來證明蘇聯深深關切美國對中共的政策。）很諷刺的是，蘇聯入侵阿富汗的部份原因可能是恐懼西方玩弄「中共牌」，但是入侵事件本身却大大地增加美國在未來玩弄「中共牌」的可能。

<sup>①</sup> 詹姆（Charlmers Johnson），「卡特在亞洲：沒有麥高文的麥高文主義」（“Carter in Asia: McGovernism Without McGovern”），載於評論（Commentary），一九七八年一月，第三十六至三十九頁。

「中共牌」究何所指？它有兩個方面：第一，它表示美國和日本的「中間地帶」(grey area)的技術，例如航空電子工程、電子計算機、人造衛星和進步的冶金製陶技術，可能輸向中共，這將使中共能在短期內改良核子武器的部署，對蘇聯產生威脅；第二，它表示傳統武器輸向中共，以便中共龐大但落伍的地面和空中部隊現代化。消息靈通的觀察家相信，第二方面不切實際，因為中共吸收技術的能力太低。目前，中共軍隊沒有能力大量使用和保養個別的步兵兵器層次以上的現代化武器<sup>②</sup>。因此，某些西方戰略家關心的，同時也是蘇聯十分警惕的，主要便是核子方面的「中共牌」。「中共牌」是極端危險的一種戰略：就核子意義言，它太富挑戰性；就傳統意義言，目前不可能。玩「中共牌」很可能迫使蘇聯試著奪取波斯灣，藉以切斷中共盟邦的石油供應；這可能已成為蘇聯入侵阿富汗所考慮的部份因素——對於過去兩年談論「中共牌」的一種反應。

儘管「中共牌」的戰略具有危險性，但在西方戰略家之間，其重要性業已大增，他們已將之視為應付美蘇權力日益不平衡的一種「速成」(quick-fix)反應。理由之一是，中共和蘇聯和解的可能性已減低。過去，有關中共和西方陣營合作對付蘇聯的提議始終遭到反對，理由是中共可能背棄其新盟邦並且和蘇聯達成暫時協議。鑑於中共領導人的年齡和過去預測中共政局轉變的貧乏紀錄，沒有人能肯定中共的對外政策會繼續下去。然而，最近的發展給人們前所未有的保證：不管誰掌權，中共和蘇聯的衝突將繼續下去。當然，我所指的是中南海島事件。過去十五年，蘇聯對河內提供一切所需，以進行越戰，但蘇聯並未與越南結盟。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的蘇越條約使情形改觀。(注意，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蘇聯也和阿富汗簽定「友好條約」)。就目前所能預測者而言，越南既已與蘇聯結盟，更可能試著統治整個法國以前所殖民的中南海島，而這是中共所不能容忍的。由於中共和蘇聯妥協的可能性減低，玩「中共牌」的可能性乃繼之而起。這是一九八〇年危機中最危險的方面之一。

詳述自一九八〇年初以來，盟邦、尤其是美國如何改變其對中共的看法，是很重要的。在今年以前，有關「中共牌」(這是個不幸的措辭，但已成為華盛頓和傳播界的術語)的談論，大多是揣測性而且是謹慎的<sup>③</sup>。然而，一九七九年間，一些有關中共核子潛力的重要而非官方的文章，開始從一些對美蘇戰略核子武力日益不平衡具有高度敏感的部門，發表出來。

也許，一九七九年二月號「三軍雜誌」(Armed Forces Journal)所載題名為「美國對蘇聯最強硬的通告：美國對中共的承認，如何支持着戰略平衡、限武談判和北約」的一篇文章，是報導核子戰略家對中共的想法最明確且最詳盡的一篇。該文的作

② 見法蘭西斯·羅曼斯(Francis J. Romance)，「中共三軍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 of China's Armed Forces”)，載於亞洲觀察(Asian Survey)，第二十卷第三期，一九八〇年三月，第二百九十八至三百一十頁。

③ 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美國和中共軍事聯盟」(“U.S.-Chinese Military Ties?”)，載於對外政策(Foreign Policy)，一九七五年秋季號，第五十五至六十四頁；包大可(A. Doak Barnett)，「中國和美國間軍事安全關係」(“Military-Securi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載於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五百八十四至五百九十七頁。

者是「賈斯亭·加林」(Justin Galen)，文中的註腳確認這是「一位前任國防部文職官員的筆名」，但新聞界則鑑定這是「能源部長詹姆士·斯勒辛格(James Schlesinger)的親密顧問的匿名，而斯勒辛格是過去五年來政府中秘密辯論美國、蘇聯和中共三角關係的一名要員<sup>④</sup>。」

此一長文包含了對中共武裝部隊能力最詳盡和公開的分析。它認為：

「美國和中共關係的改變，使西方技術有可能流向中共，這將使中共的軍力增加到某種程度，而逐漸迫使蘇聯採取保守的、防禦性的和『和解』取向的戰略……重要的是體認出中共為改進其戰略力量所需的，本質上並不是純軍事性的。中共所需要的是某種重要的應用性的技術，以改良其導引系統、航空電子工程、飛彈技術和炸彈的主要成份……中共增加其核子武力不受任何條約拘束，而且此一核子武力可能從今天成百無效且易受摧毀的系統，成長為一九八〇年代後期成千有效且不被摧毀的系統……目前問題是，西方和東方能否合作以對付介於兩者中間的那個國家。卡特政府已經投下賭注，試圖去完成這個目標，而……這似乎是華盛頓最精彩的一場遊戲。」

儘管「加林」先生斷言「卡特政府已下賭注」，然而並無公開證據可證明美國在阿富汗事件以前已在秘密追求核子式的「中共牌」。然而，一九八〇年一月國防部長哈洛德·布朗(Harold Brown)訪問大陸之後，美國放棄了國務卿於前一年(一九七九年)十月再度強調的政策。布朗在北平時許諾，美國準備開始和中共建立國防關係，而且當中共副外長曾文晉於三月間訪問華盛頓時，美國便已履行這項許諾。國務院在給一千五百家左右美國廠商的信中，大致上同意出售軍用車輛、運輸機、電子設備和空中偵察裝置給中共<sup>⑤</sup>。這是否等於核子式的「中共牌」，還不清楚，但是蘇聯人已注意到，至今未曾有任何一位美國國防部長到過莫斯科，然而却有兩位——前任的斯勒辛格(於毛死時)，和現任的布朗——到過北平。

當然，阿富汗是產生這種政策變化的媒介，但是這個政策所針對的問題，比波斯灣的情勢要大得多。這問題首先是指，由於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至末期美國戰略劣勢而為蘇聯開啓的「機會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一九八一財政年度報告警告說，「在美國目前所擬定的計劃生效之前，美國正面臨著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的特殊危機。這種危機將持續一段時期。」為了克服美國戰略核子武力在這段時期的差距，並且鑑於蘇聯在阿富汗事件中表現的有意利用其暫時的優勢，

④ 三軍雜誌(Armed Forces Journal)，一九七九年二月，第三十至三十五頁；Internews，一九七九年四月九日，第十六頁。也參見「范錫斷言對中共武器禁運；他反駁五角大廈幕僚之研究」，紐約時報，一九七九年十月五日；第十一頁；「美國限制使用中共牌」，基督教科舉證書報，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第五頁。

⑤ 「國務院批准軍事裝置輸給中共」，華爾街日報，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八日，第十六頁。

才導致美國尋求「速成」辦法，以恢復平衡<sup>⑥</sup>。尤其是由於行動緩慢的美國政治系統對各項開支的先後順序未能作急劇之改變，以及美國、北約和日本之間對西方困境的看法有明顯的差異，以致有些美國人似乎認為中共可以成爲這種「速成」工具。

核子式的「中共牌」在「技術上」合乎實際嗎？這雖無法知道，然而，關於這一點，我個人認爲是可能的。一九七五年中共發射三枚人造衛星，表示它有決心發展太空計劃而不只是作宣傳，而且美國和中共已簽定包括太空技術（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和高能物理（一九七九年一月）在內的科技合作協定<sup>⑦</sup>。中共在洲際飛彈計劃過程中遭遇困難，固然不假；而「中間地帶」技術的輸入可以克服這些困難，也同樣可信。

然而，即使核子式的「中共牌」證明有可能，美國和中共能相信彼此是「心照不宣」(facit)的盟邦嗎？雖然這並非完全不可能，但是這種協約的最大威脅，就目前而言，不是中共和蘇聯的和解，因爲鄧小平於三月接受「讀實新聞」的訪問以及同月中外長黃華在東南亞的談話都極度反蘇<sup>⑧</sup>。

最大的威脅是，中共反蘇的驚人措辭和巧妙外交，對美蘇和日蘇關係的破壞，更多於對盟邦關係的尋求。從這個觀點來看，中共的意圖是要美國和日本爲其對外政策付出代價，藉以解除蘇聯對中共的威脅，而中共本身則只作稍許甚至不作任何貢獻。

白魯恂(Lucian Pye)最近指出，雖然中共於十年前偽裝改變其對外政策，支持全球性的反蘇陣線，但是事實上它在這段期間「很少努力改進其軍力」。白魯恂懷疑中共呼籲全球反蘇陣線可能是一種「騙局」<sup>⑨</sup>。中共對國防部長布朗於一月間的某些談話表現冷靜，可能證明白魯恂的揣測不錯，也可能只是反映出中共面對美國人的善變而必須保持警惕的意思。這裏的危險之所在是，美國和日本實際上也許不可能藉和中共合作來改進對蘇聯的武力之平衡，但是他們企圖這麼做，一旦蘇聯攻擊中共，他們將須承擔起暗地裏防衛中共的義務。

另一個似乎在美國常被忽略的問題，就是日本人把中共視爲「盟邦」這件事。日本人不把中共視爲一張「牌」或「王牌」。在許多方面，中共和日本的新關係，在與中共和美國新關係的比較之下，已經成爲中共對外政策的更大成就，而且也更令蘇聯

⑥ 見威廉·范克利夫教授(Professor William R. Van Cleave)於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四日在衆院軍事委員會證詞。克利夫發明「快速調節」一詞。

⑦ 見詹姆斯·奧伯格(James Oberg)的「中共的太空計劃」(“China in Space”), *Current Scene*, 第十五卷, 第八和第九期, (一九七七年八月和九月), 第十二至十七頁; 美國國務院, 「美國和中共的交換」(“US-PRC Exchanges”), *Gist*, 一九八〇年三月。

⑧ 讀實新聞訪問鄧小平, 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日, 第四頁; 黃華訪問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見(倫敦)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第四十二頁。

⑨ 白魯恂(Lucian W. Pye), 「美國在中共現代化中的困境」(“Dilemmas for America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 第四卷第一期, 一九七九年夏, 第一至三十九頁。

擔憂。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九日，亦即在日本外相園田和中共外長黃華於八月十二日簽定十年中共與日本友好和平條約將近兩個月之後，蘇聯駐日本大使德米特里·波里昂斯基（Dmitri Polyanski）向日本外相遞交一項正式的抗議，其中表明，「不論日本的意圖如何，與中共簽約，將使日本捲入和中共聯合反蘇的同盟中。」自一九七八年夏以來，情勢的演變雖表明波里昂斯基的話有幾分道理——但是蘇聯所作所為迫使日本倒向中共的成份比中共努力拉攏日本的成份還多。

蘇聯以炫耀武力的方式作為對中共和日本條約（其中含有反霸條款以及日本否認這項條款針對任何特定的國家）的反應。蘇聯部署了大約一萬人（一師）的兵力於千島羣島南部，一九七八年先從擇捉島和國後島開始，而於一九七九年延伸到色丹島（一九五六年蘇聯曾許諾，在和約簽定之後，擬將色丹島和齒舞島歸還日本）。日本視蘇聯此舉與其在古巴部署戰鬥部隊頗相類似，但是更具威脅。戰後第五冊日本防衛白書（一九七九年七月）也提到，莫斯科的太平洋艦隊的力量幾乎和美國第七艦隊「相等」。

日本政府公開表示，擔心美國在太平洋力量的衰退、蘇聯力量的成長和蘇聯可能進行軍事勒索等。日本已對美國所謂的「迴旋戰略」（Swing strategy）（假如歐洲有危機，則將美國在太平洋的部隊調往大西洋）表示抗議。這種戰略是布朗擔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時，於一九七八年一月首次公開透露；布朗擔任國防部長後，於一九七九年十月在東京再度予以證實。一九七九年七月間防衛廳長官山下元利訪問韓國，這是日本防衛廳長官首次訪韓。雖然日本預測其國防開支將從目前的九十七億美元增加到一九八五財政年度的一百九十五億美元，但日本國防的基本態勢並無決定性的改變。大半由於中共和兩個超強政策及能力的改變，今天日本比中共政權建立以來任何時期更容易接受中共的世界觀。

這不表示日本可能加入中共、日本和美國三邊的反蘇協約，原因有二：1. 即使中共和日本之間可能建立有效的安全關係，這種關係危害日本安全的程度要大過加強日本安全的程度。中共尚無能力將它的力量伸展到臨近疆界以外，而日本的安全問題涉及蘇聯的，主要是戰略核子關係和海洋通行自由方面；2. 美國在日本的眼中已成爲難以預測的盟邦。美國的力量是否衰退仍不明朗，但美國內部對於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對於蘇聯威脅和長期目標的界定等問題，都有很深的歧見。在這些問題尚未澄清之前，日本將不輕易下賭注。

中共和日本之間的經濟聯繫已相當顯著。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八年間，日本和中共貿易每年都比日蘇貿易多十億美元左右，但是日本和中共、蘇聯雙方的貿易都保持相同的成長率。在一九七九年上半年（一月至六月），中共和日本貿易躍升爲三十三億美元，比一九七八年上半年的二十一億美元多了百分之五十六點三。在同一時間內，中共佔日本全部輸出的額度，由百分之二點七（第七位）升到百分之四點三（第四位）。這種趨向可繼續下去，尤其鑑於中共於一九七九年七月八日公布「中共和外國合資經營企業法」。蘇聯斥責日本優先融資其對中共的貿易，部份原因是日本至今一直不願對蘇聯開發西伯利亞（尤其是秋門）提

供類似財務安排。然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首相大平却在北平同意給中共五百億日圓（按一美元兌換兩百二十日圓計，即二億二千七百萬美元）的政府貸款，這還可能只是未來十五億美元政府貸款的第一部份。一位著名的日本評論家警告說，不管日本的意圖如何，日本正逐漸捲入「中共牌」的戰略中，並且使中共對於快速經濟發展的期望變得更不切實際。他擔心，假如由於現代化遲緩而導致中共更進一步的政治動盪，這筆貸款的下場將和一九一七—一八年的西原氏貸款無異<sup>⑧</sup>。

日本主要的問題是：1. 需要分散市場和原料來源；2. 自由通行海洋；3. 來自蘇聯的勒索和封鎖之威脅；4. 區域穩定（韓國、臺灣和東南亞國家協會）。擴大對中共之貿易解決了第一個問題，但加重了其餘的問題。與中共作軍事合作不能符合日本維持海道安全或阻止蘇聯壓力的要求。

總而言之，「中共牌」並非「速成」辦法；它可能導致整個東亞地區的不穩定，而且它本身還帶有超強間戰爭的威脅。盟邦的對外政策最困難和最敏銳的問題之一，是對毛死後之中共的關係，需要深思熟慮；但由於至今美日對中共的態度所表現的幼稚天真、機會主義和搖擺不定，將使這種思慮過程加倍困難。

一九八〇年危機的第二個因素——蘇聯的軍備擴張——有比較完善的報導，不需我們在此多費心思。這裏只需提到，在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九年間，美國的戰略飛彈數目並無改變（一〇五四個洲際飛彈和六五六個潛艇發射彈道飛彈），而美國的長程轟炸機則從五六〇架降為四三一架。在同一時期，蘇聯的洲際飛彈由一〇二八個增為一三九八個，潛艇發射彈道飛彈則由一九六個增為一〇二八個。尤其對日本，同樣重要的事實是，一九七八年蘇聯的伊凡·洛可夫號（Ivan Rogov）——這是比蘇聯以前所有艦艇大三倍的新型高性能登陸艦的第一艘——下水；同年四千噸的航空母艦明斯克號在黑海試航。一九七九年間，這兩艘戰艦都調到太平洋艦隊。蘇聯海軍力量最近的增長，已使美國在西太平洋力量的衰退和日本無重大能力去彌補這種差距的現象，變得更為顯著。

一九八〇年危機的第三個因素，亦即越戰和水門事件後美國人不願負起超強的責任，也許是最嚴重的因素。卡特政府的許多創舉，例如人權、防止核子擴散、在巴拿馬和南部非洲安撫第三世界的表現等，本身是值得讚許的，但是十年來，這些創舉最多只能說是夢想。這些創舉是否導致了如伊朗革命的各種挫敗或已引起蘇聯錯估其策略運用之範圍，是個值得爭辯的問題。阿富汗事件以後的政策改變，剛剛開始，它的整個幅度還不可知。美國國內政治，尤其是今秋大選，將會大大地影響政策改變的行程。卡特可能成爲自由世界的領導人，也可能仍舊只會向世人說教，也可能到明年一月兩者都够不上。

更重要的是，美國欲肯定自己的任何企圖，都將使它和盟邦的經濟承受很大的負擔。恢復經濟的承諾，包括提高生產力、控

<sup>⑧</sup> 田嶋嶺雄 (Mineo Nakajima) 、「『冷戰』世界中的日本和中共關係」(“Japan-China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Cool War.’”) ~ Look Japan,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第四至五頁。

制通貨膨脹和從事研究發展等，是國防開支的先決條件，然而這些問題仍在總統和執政黨（在過去四十六年當中控制國會達四十二年之久，甚至比日本自民黨的紀錄還長）之間，爭辯不休。

美國和其盟邦能團結無間嗎？美國於一九七〇年代所採取的部份重要創舉，是對盟邦批評稍早美國政策的反應（例如，在越南，美國並無盟邦強有力的支持）或者是由於美國真的失去盟邦支持的結果（例如，對中共的政策即由於美國體認它的盟邦已成了中共的主要貿易夥伴以及舊有的政策無法在聯合國中得到多數的支持）。今天，日本、西歐和美國似乎對伊朗革命和阿富汗被侵的重要性，又有不同的看法。除非美國得到盟邦的支持，否則它不可能負起新的冷戰的責任。一九八〇年代的最困難工作之一，將是在危機的性質方面獲致盟國間的一致意見並且如何去應付這種危機。

假如一場新的冷戰真的展開，則它在許多方面將和舊的冷戰有所不同。例如，它的思想層面將較少。今天的蘇聯，與其說是一個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國家，倒不如說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政權，它的政治發展跟經濟、社會發展相比，要落後得多。尤其自中共叛離之後，蘇聯能提出的思想號召很少，兩個權力中心的競爭，在實際表現方面要比口頭上的誇耀來得重要，這點對西方是有利的。兩個陣營將不像第一次冷戰那樣處於隔離狀態；談判和競爭能夠而且應該同時進行，而且只要嚴格的責任和互惠能夠獲得的話，談判應該可以產生協議。兩次冷戰的主要不同是，兩個體系的能源將受到威脅；控制能源的競賽將和任何政治衝突同樣重要，尤其鑑於蘇聯於十年內將成爲石油輸入國。對西方盟邦而言，有效的能源轉換和保存政策，不久之後不僅是經濟上也是政治上的必要措施。

讓我們展望未來以結束對一九八〇年危機的檢討。短程的，亦即兩、三年後的未來以及十年後的遠景如何呢？短程的未來並不容樂觀。日本、美國和西德都將舉行選舉，在選舉之前，任何重大的措施都不可能產生。蘇聯在阿富汗的處境可能很窘，但極不可能落到像美國在越南那樣的悲慘下場。（原因之一，蘇聯國內並無反對勢力。）以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滿洲來和蘇聯入侵阿富汗相比，較爲恰當：蘇聯人會遭到抵抗，但有能力鎮壓反抗並建立傀儡政府。蘇聯似乎不可能永遠佔領阿富汗。同樣的，一年之內伊朗的情況難以預料，但是何梅尼以後的政權很可能是親蘇的左傾政權。

長遠的未來較爲引人。蘇聯的生產力無法與北美、西歐和東亞的相比。特別是太平洋沿岸已成爲地球上經濟最活躍的地帶。中共對世界的態度之改變十分重要。美日高估中共經濟潛力的危險總是很大，但是中共對於自由世界經濟的日益加入，就資源和市場方面來看，却是一個「正數」。同樣重要的是韓國政治最近的改變——朴正熙之死和南北談判的展開——使我們相信，韓國的「奇蹟」仍將持續而且擴展。一九七〇年代南韓是地球上經濟成長最快的國家。

簡而言之，伊朗和阿富汗可能已適時地警惕民主陣營必須改弦更張。和蘇聯相處的唯一方法便是權力平衡。只要民主陣營有國防準備，並且不以試圖玩「中共牌」而輕易得之，則沒有理由可以懷疑和平與平衡不能維持。從另一方面來看，一九七〇年代末期趨勢的延續，預兆着武裝衝突的真正可能，不是導致蘇聯方面的錯誤估計，便是盟國方面的自暴自棄。